

盛唐皇家书库的秘书监

阿倍仲麻吕：秘书监



兰台翰墨，盛载千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对世界不同文明兼收并蓄，为文明发展不断注入活水，是成就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书籍文献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增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我国对外典籍交流的历史上，涌现出无数人物，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吕，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入唐后改名朝（晁）衡。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担任秘书监等官职，负责管理浩如烟海的皇家藏书。阿倍仲麻吕既是大唐盛世藏书的见证者，又是中日文献典籍交流的推动者，为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作出重要贡献。

高中进士的“外国留学生”

盛唐时期，我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威远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风气贯穿整个社会。为了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日本不顾当时海上交通的艰难险阻，选派国内最优秀的人才组成遣唐使团渡海赴唐。遣使入唐被日本朝廷视为“国事”，二百多年间，日本共派出19次大型入唐使团，包括使臣、留学生、留学僧等。“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遣唐使不只是日本国的外交使节，更肩负着重大的文化使命。他们全面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包括政治、律令、礼乐、语言、天文、医学、技艺等各个领域。大唐开元年间，年仅19岁的阿倍仲麻吕被选为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成员，乘船到达了他日思夜想的长安城。翌年十月，遣唐使团“所得锡赏，尽市文籍，泛海而归”，为日本带回了大量汉籍诗文以及佛经等；但“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晁）衡”。

阿倍仲麻吕留恋大唐的繁华景象，决定长住长安继续深造。他入国子监大学，与贵族子弟一道，在最高学府攻读《礼记》《左传》《诗经》等经典。他聪颖勤奋，敏而好学，熟读经史子集。太学毕业后参加科举，阿倍仲麻吕一举考中进士。

阿倍仲麻吕通过唐朝科考成为进士。进士是高等文官仕补，要求深通天下大政，长于诗文，就是本土人士也只有少数才能优胜高中，连李白、杜甫都频频应试却屡落榜。阿倍仲麻吕作为一个外国人，取得进士的桂冠，可见确有出类拔萃的学识文采。

中举后不久，阿倍仲麻吕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负责校刊经史子集，辅佐太子李瑛研习学问。校书郎是一个要求文学兼优的美差，也是及第举子仕途起家的良选。阿倍仲麻吕在职期间辛勤校刊书籍，与友人漫步纵谈学

问，好友储光羲描写他“吾生美无度，高驾壮春坊。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此后历任门下省左拾遗和左补阙、仪王友、卫尉少卿、秘书监兼卫尉卿、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等官职，大部分都是与整理藏书相关的文职。其中以秘书监职务最为人所称道，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首位外国人担任皇家书库秘书监的先河。

皇家书库的秘书监

秘书省，是古代中国管理官方藏书的机构。秘书省制度源于上古史官，在东汉时期正式设立秘书监，西晋时独立成为与中书省并立的机构。秘书省作为国家图书收藏和管理机构，职司图籍购募、整理、皮藏等工作，在唐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叫作秘书监，从三品，掌经籍图书之事，领著作、太史二局。秘书监的任命对学术和文才的要求甚高，需“学资流略，词兼典丽”“沉郁成章，丽而有则”才能当选，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马怀素、贺知章、颜真卿等名人都曾担任过秘书监。

贞观元年至玄宗天宝十四年是唐朝图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朝廷发动了大规模的校书、书写和编目活动，形成了“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的景况。天宝十一年（752年），54岁的阿倍仲麻吕就任秘书监，成为第一个担任大唐秘书监的外国人。

阿倍仲麻吕任职期间积极活动，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引导日本遣唐使认识中国典籍。就任秘书监的当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等人率使团到达长安，受到唐玄宗接见。为了增进日本友人对中国的了解，唐玄宗特地安排阿倍仲麻吕为向导，引领日本使团参观长安大明宫的皇家书库和收藏儒、道、佛三教典籍的三教殿，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

后期安史之乱使图书事业遭受巨大损失，阿倍仲麻吕一方面尽力补充整理秘书省藏书，一方面协助朝廷物色新的秘书监人选。晚年他举荐了称职的接班人——遣唐使藤原清河，大唐的图书事业也随着政局的安定而很快复苏。

阿倍仲麻吕仕唐五十年不曾归国，为唐代典籍文化的繁荣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奉献了一生。他擅长诗词歌赋，常与好友王维、李白诗歌相和，其诗篇《衔命还国作》：“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深切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留恋之情。

中日汉籍交流的“樱花使者”

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上，唐代汉籍的东传是一大景观。据日本9世纪末编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汉籍有1579部，16000多卷，大致已经摄取了隋唐官廷藏书的一半左右，大部分是由日本遣唐使遍寻求购、抄写后带回的。日本遣唐使携书归国场面盛大，有诗赞云：“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海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

阿倍仲麻吕虽然一生没有回到故乡，没有直接向日本人民传授中国文化，但他推动了大量唐代汉籍的东传。他帮助购了大量政治、文化、经济、建筑、科学、天文、历法等书籍，通过遣唐使团送回日本，比如通过他的少年好友、遣唐副使吉备真备，把大唐先进的《大衍历》传入日本并进行历法变革，传入《唐礼》以确定日本朝廷礼仪等，为日本正在进行的大化改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他还促进了两国学者的交流学习，如鉴真和尚五次东渡皆未成功，但在阿倍仲麻吕等人的真挚邀请下，第六次终于成功到达日本，传入佛法、中医、书法、雕刻等典籍和技艺，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汉籍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漂洋过海，为日本所借鉴和吸收，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日本现存的唐代汉籍，不仅是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象征，更是对如今的文化挖掘与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有些典籍在国内已散佚或遗失，但在日本却能找到保存完好的善本。这些“中国典籍异乡孤儿”的发现和回流，对研究我国古代典籍历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阿倍仲麻吕少小离乡，结发游圣，负笈辞亲，名成太学，而后终生留仕长安，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唐朝图书事业。1972年，郭沫若《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中写道：“昔鉴真盲目，浮铎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光矣。”

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为中日典籍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他担任皇家书库的秘书监的这段史实，也在源远流长的藏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魏晋南北朝民族服饰与胡汉服饰文化交融

□ 谭沙龙

在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时期形成的以古朴为总体特征的汉民族服饰文化，伴随东汉政权的覆没而土崩瓦解。而随着徙居华北边境的匈奴、羯、鲜卑、羌、氐等游牧民族先后入主中原，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促使胡、汉杂居，南北文化交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外来异质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影响，促使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由一元发展转入多元碰撞。这一切，使魏晋南北朝服饰艺术异彩纷呈，内涵十分丰富。

胡服内渐

中国历史上，胡服流入中国肇始于战国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此后，胡族服饰文化源源不断内传中国。不过，秦汉时期，只是戎服及上层人物服饰受影响较大。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直接将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带入中原地区。这些民族有匈奴、羯、鲜卑、羌、氐。

汉代匈奴人主要生活在北方草原，日常衣装多为用皮韦或裘裘制作的袴褶。褶衣的形制是左衽、缙领、窄袖。匈奴人日常生活中一般都戴帽子。根据山东济南汉墓出土石刻，可以推断他们所戴帽子的常见样式是尖顶帽，多用织物缝制，然后饰以动物皮毛和飘带。此外，匈奴人又有穿靴子的习惯。他们在野外行走、骑马时，多穿皮靴，而在室内闲居时则多穿长筒靴或毡鞋。

羯族是以西域胡人为主的民族共同体。羯族早期主要分布在上党、武乡、羯室，后迁徙至现河北区域内。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在中原建立后赵政权。羯族的日常服饰情况史书中少有记载。不过，羯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宫廷中流行穿袴褶。后赵宫中女子多流行着紫纶巾，穿五纹织成靴。

魏晋时，鲜卑一部西迁至河西走廊一带，史称西部鲜卑。早期的鲜卑人日常生活中多穿韦袴褶，腰间上系有带钩、带扣的皮腰带。他们的褶衣为大、小袖子的夹领衫或襦袄，袴为大小、小口膝部加缚的裤，多用羊皮做成。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为抵御北方冬季严寒，鲜卑人也穿靴戴帽。

氐族人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氐人擅长织布，其纺织品有缁、氍等，多用麻为质，颜色青绿绦。氐族人在出嫁时常穿类似于汉族中国袍的衽

（上接1版）

深刻认识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意义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动力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从国内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一系列长期积累形成的矛盾和问题，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为凸显。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客观上要求更好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源泉。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需要新的生产力引领传统发展方式变革，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看到，当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未根本转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大，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生产力不断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跃升，有效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就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向扩大开放要活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等关系，以深层次改革激发新动能和扩大开放新空间，以更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胡易汉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服饰因胡汉杂居、便于劳作等原因在汉族劳动阶层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后，鉴于他们本族习俗穿着不足以炫耀他们身份地位的显贵，便改穿汉族统治者所制定的华贵服饰。许多少数民族帝王官员开始醉心于高冠博带式的汉族章服制度。如十六国时期汉赵第三位皇帝匈奴人刘聪在当上皇帝后，就规定自大司马以上七公全都“绿綬绶，远游冠”。前赵皇帝刘曜则规定“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由此亦可看出，当时移居中原的匈奴女子已喜爱上华丽的汉族锦绣衣物。汉化程度较高的后赵皇帝石勒对汉服的喜欢程度更是自不待言，他在朝会时常“以天子礼乐谯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当他看到清贫的参军樊垣衣冠弊坏时，立刻擢授其官，赐以钱物。前燕立国后，皇帝的朝服“倂踪虞、夏”，穿用汉服，并规定“皇代永制”。景昭帝慕容俊在位时，规定太子和诸王都戴传统汉族文士之冠——远游冠。前秦王苻坚不仅自己穿用汉服，还曾将汉式朝服作为赠品赐给前来朝拜的车师前部王弥实和鄯善王休密驮。建立后秦的羌人姚苻称帝后，“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同样使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需要新的生产力引领传统发展方式变革，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看到，当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未根本转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大，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生产力不断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跃升，有效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就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向扩大开放要活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等关系，以深层次改革激发新动能和扩大开放新空间，以更高水平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落实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任务

新征程上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提高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提高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宽度，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

用汉族章服制度。

当然，胡易汉服最有代表性的还得数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公元486年，身为鲜卑人的孝文帝首先自己开始穿着袈冕。494年，已迁都洛阳的他开始着手改革鲜卑人的衣冠制度。495年，在他接见群臣时班班赐百官冠履，以代替传统胡服，并诏令全国上下禁止穿鲜卑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考古发现的北魏宁朔县郑氏墓窟窿画像，就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后的服装风格。画像中的男子头戴冠冠，身穿曲领大袖衣、裙裳、笏头履、大带、笏冠旁插簪导，并有饰物自冠顶弯曲至额前。他的侍女梳双髻髻，穿大襦裙，外套两裆，腰束绶带，穿笏头履。不过，受民族文化习惯影响，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服饰汉化政策并不彻底，当时有许多人不遵诏令，依旧穿着他们的传统民族服饰。甚至连孝文帝的太子都率先反对，并私着胡服，从洛阳偷偷逃回平城。太子的抵抗之举令孝文帝十分恼火，遂将太子废为庶人。孝文帝之后，许多北魏鲜卑人又开始恢复胡服，只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把汉服和胡装搭配着穿。

碰撞与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入及西域、中亚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加深，促使汉族服饰文化与外来异质服饰文化间产生激烈碰撞。当然，这种激烈碰撞是相互的，其直接表现就是对对方服饰文化的反对、排斥与抵制。一方面，当汉人穿着胡服时，会招来反对。如魏文帝曹丕身为皇太子时，有一次穿着袴褶出去打猎，就有人劝谏他不要穿。当魏明帝曹叡戴着刺绣小帽，穿着白纱胡服半臂召见群臣时，大臣杨阜就直言相问：陛下，你穿这种服装，我们该用哪种礼法呢？明帝被问得无言以对。其实，杨阜言外之意是说魏明帝不应穿着不符合汉族礼仪的外族服饰，这显然是对胡服的排斥与反对。另一方面，当胡人改换汉族服饰时，也会招致抵制。如北魏孝文帝颁布易服令后，北方许多鲜卑人持反对意见。其实，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胡汉两种服饰文化之间的碰撞从未停止过，它们或者以明争方式，体现在南朝和北朝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或者以暗斗方式，体现在一朝之中的贵族阶层和劳

临新的任务、更高的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在工作上见实效。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统筹谋划改革开放，系统性考虑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协调联动性，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鼓励创造性的角度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在顶层设计指引下鼓励各地方、各行业积极寻求有效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加大典型经验交流推广，以实践探索经验来不断丰富完善顶层设计。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为抓手，推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关键领域制度规则统一，建设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各种生产力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更好发挥财税体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为重点，积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部署，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重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投资、贸易、金融等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

动者阶层之间。

不过，在碰撞之余，魏晋南北朝胡汉两种服饰文化交融却是时代主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胡、汉杂居，南北文化交融逐步加大，服饰艺术在多民族之间互通互鉴。中原地区的汉族普遍学习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优点，北方少数民族也由上而下对中原汉族服饰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抛弃本民族传统的服饰，以汉民族服饰取而代之。汉民族学习少数民族服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学习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制作的基本风格，即紧凑合体、利落实用。如魏晋时期妇女的服装，由于注意吸取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中的一些神韵，体现出了更为突出审美的实际效果。如上身穿一种衫、襦，下身穿一种腰身紧凑合体、裙体下摆敞阔、袖筒宽松肥大的裙子，这种裙子裙长及地，带有飘逸感。就连深衣也在腰部加了围裳，从围裳伸出的长飘带也为女性增添了妩媚。

二是学习借鉴北方少数民族一些具体实用的服饰形制。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比中原地区那种宽衣博带的穿着更为实用、更为经济，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如前文述及的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袴褶、两裆、半袖衫都是从北方少数民族传入的。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还会充分利用簪钗、步摇、梳篦、指环、耳坠、金奔马饰件、金花饰片等来与上述衣装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美的魏晋南北朝妇女还学会了使用假发来编制各种发式，如编成飞天髻、灵蛇髻、盘桓髻等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汉民族的服饰内容。

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学习汉民族服饰主要表现在：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大多改革衣冠，承袭汉人服章制度。二是像北魏这样推行汉化政策的少数民族直接改穿汉人服装。是一些少数民族借鉴汉族服饰优点，改革自身民族服饰。如出土北朝文物就有右衽胡人的形象，也出现过大袖衣衫的胡人形象。这些服饰形制都是有悖于胡人传统服饰习俗的，明显地吸纳了汉服衣饰制作的某些特点。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大时代背景下，胡汉服饰文化既相互碰撞又相互交融，并为这一时期中国服饰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外资。加快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进一步完善外贸管理方式，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和应用，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支持对外开放平台探索制度创新，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支持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和功能，支持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探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规划对接、机制对接、市场对接、项目对接，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相衔接，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

完善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落实机制与激励机制。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开放任务，更需要加大抓落实的力度，加快完善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精准高效的落实机制，调动各方面改革开放积极性，健全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凝聚改革攻坚合力，推动改革开放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统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对各部门、各地方和各领域的工作提出了更高效协调、协同推进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不折不扣抓落实，胸怀大局、干在实处、有效发挥督查督导作用，充分肯定典型经验做法、激励创新，同时及时指导帮助改进工作、鼓励进步。加快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要求，释放担当作为、为负责负责、为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的信号，积极营造激励干部心无旁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